
中国文史丛书

ZHONGGUO WENHUASHI CONGSHU

佛教与中国文学

孙昌武著



周谷城主编

中 国 文 化 史 丛 书

ZHONGGUO WENHUASHI CONGSHU

佛教与中国文学

孙昌武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丛书常务编辑 王有为
丛书封面装帧 范一辛
本书责任编辑 王有为

• 中国文化史丛书 •

周谷城 主编

佛教与中国文学

孙昌武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鹿行联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3 字数 266,0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000 (内精装本2,000)

ISBN7-208-00117-0/K·27

定价 平装本5.95元 精装本10.20元

1015/12

编者献辞

以悠久、丰富、灿烂见称于世的中国文化，哺育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——中华民族。

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文化，为人类的进步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珍藏。

今天，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，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新的纪元；世界上过度物质化了的国家，重新又把它们的目光投向文明的古邦。

于是，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，描绘它的真实面貌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，评论它的千秋功过，规划它的锦绣前程，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，摆到了我们的面前。

这套丛书，因此诞生了！

我们设想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，诸如区域文化，民族文化，考古学文化，科学工艺，生活起居，思想学说，语言文字，艺术文学，体育武术，宗教神话，文化制度，文化事业，文化运动，文化交流与比较等等。

当然还需要综合性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。我们期待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通史著作问世。在这以前，以体现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特色为宗旨的一系列著作，也将列入我们的丛书。

既称丛书,又受作者、编者和出版者各种条件的限制,内容自然难免不齐。我们企求在不齐中略见一致,所以争取在五年内先刊行五十种,以期初见系统性。但愿我们的初衷,十年刊行一百种,能够实现,那时读者也许会觉得这套丛书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了。

任何关于编好出好这套丛书的建议和批评,我们都竭诚欢迎。

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

1984年10月

前 言

本书是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一个历史的、概括的描述。描述的重点在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方面。

在这本书里，笔者不是把佛教单纯作为一种宗教来研究和批判的，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、一种文化现象来处理的。这样的处理，绝没有推崇和美化佛教的意思。笔者以为，就是从批判宗教迷信和宗教唯心主义的角度讲，也只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认识佛教，揭示它的真实面貌，才能认清它的本质，达到批判的目的。

把佛教当做意识形态看，它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长河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人类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人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是用宗教的观点认识世界的。具体到佛教，它的那套思想、理论不是释迦牟尼及其信仰者们凭空想象出来的。作为一种思想意识，它们只能是现实的反映。而作为一种宗教意识，这种反映中必然有迷信、有谬误、有偏见，但它总会包含着一定的、哪怕是片断的积极的认识成果。恩格斯在谈到基督教时曾指出：“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、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。简单地说它

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”^①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佛教。人类认识世界，就是在充满片面性、表面性和谬误的行程中不断地向着真理前进。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看，佛教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。虽然其努力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，但也取得了不少认识上的积极成果。这也就是佛教在历史上延续久远、到今天仍然存在的缘由。这里应当说明一点：在研究宗教现象时，我们当然不可忽略它被“利用”的一面，特别是统治阶级利用它来达到政治上的和思想统治上的目的。但这里讲的不是这一方面。

佛教的发展历史久远，传播领域广阔。印度佛教自阿育王于公元前三、二世纪之际立为国教以后，就取得了统摄印度思想学术的地位。印度在直到佛教衰亡的一千几百年间，意识形态的各个部门可以说基本是在佛教思想理论的笼罩之下。印度历代的许多佛教大论师，同时也是代表当时一代思想水平的大思想家。这就决定了佛教思想虽然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体系，最终目的是在确立宗教信仰，但在认识上却有一定真理的内容。例如大乘中观学派立真、俗二谛来证成我、法两空，主张物质与精神世界的一切都处在生、住、灭、异的变化过程之中，它们只是由于因（内部原因）缘（外部条件）和合而存在，故变动不居，没有自性。这种理论就很有辩证色彩。大乘瑜伽行学派提出“八识”、“三能变”的观念，把阿赖耶识、末那识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前六识分成三类，在对它们进行细密分析的基础上，论证了“境不离识”、“万法唯识”。这在认识实践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9卷，第328页。

与意识的一致性方面也含有有价值的内容。如以上这样的理论，最终都导致唯心主义的结论，但其中又都包含着某些片面的真理。它们所探讨的多是属于所谓“心性”范畴的问题，而这些，正是中国传统学术较少注意的。

佛教传入时的中国，已经是一个有着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的国家。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于佛教，不是消极地接受，而是积极地摄取，即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，实现对外来宗教的吸收和改造。中国佛教的义学大师们，大多精通华、梵，深研外典，在中国的思想条件下吸取和发展佛教思想，促进它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融合。六朝到唐代的中国佛教各学派、各宗派，大都有较丰富的理论内容。如僧肇的般若性空理论，道生的涅槃佛性学说，以及后来天台的“三谛圆融”思想，华严的“法界缘起”观念等等，都对大乘佛学做了积极的发挥，并融入了儒家学说等传统学术的内容。后来的禅宗更是纯粹的中国士大夫的佛教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，思想学术界展开了长期、激烈的反佛与护法的斗争。这不但锻炼了斗争的双方，而且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交流。

把佛教作为文化现象看，佛教教义中包含有哲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是不言而喻的。在佛教的议论与辩论中，发展起因明即佛教逻辑学，这是古代世界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 and 中国的墨辩之外的三大逻辑体系之一。在佛典的著述和吟诵中发展了声明即语言声韵之学，仅拿它对中国的影响来说，便直接促进了古代汉语反切规律的总结，丰富了中国音韵学；又间接影响到中国诗歌对声律的运用，促进了近体诗的形成。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则更为密切。许多佛典很富于文学色彩，

其中有些本身就是文学创作。佛教的思想、观念和它的取材、表现方法、语言等,都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学术界有“佛典文学”的概念,在中国也叫“佛典翻译文学”;还有更广义的佛教文学,一般是指那些佛教徒创作的、宣扬佛教思想的文学作品。佛教更潜移默化,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影响它所传布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学艺术。佛教的偶像崇拜,发展出成就杰出的佛教美术。佛教的塔寺建筑,是建筑史上的伟大成就。佛典的义疏科判,丰富了文献注疏的方法,对中国传统的儒家章句注疏之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。此外,围绕着佛教,还形成了有关佛教史、佛教文献、佛教礼仪制度、佛教经济等等众多的学术研究部门。与佛教有关的学问,还有中印(中亚)文化交流史,汉、梵语言学等等。在诸如此类众多的文化领域内,佛教都创造出一定的成绩。

人类的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、不断扬弃、不断发展的过程。佛教文化是这种积累的一部分。佛教的唯心的、消极的一面必然深浸到与之相关的文化之中。但既是文化,就又有其独立的价值。例如我们评价佛像和佛画,就不能只看到它们是宣扬偶像迷信的手段,它们还往往具有与宗教完全无关的美学上的内容。所以我们研究佛教,必须善于区分出其中独特的有文化上的积极价值的部分。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亦应作如是观。

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,一种文化现象的理由与意义就是如此。当然承认这一点,并不影响我们对佛教的本质进行揭露和批判。

如前所述,中国人是在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佛教的。在接受方式上又有一些特点。

中国自汉武“罢黜百家”直到清季，在思想领域形式上是儒家圣人之道定于一尊。但实际上，汉武时期的所谓“儒术”已远非孔、孟真传。此后，汉儒章句之学一乱之于谶纬神学，再乱之于玄学。魏、晋之际，承汉末社会大动乱之后，儒家那种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受到严重冲击，学术思想界也出现了比较开放自由的局面。正是在此期间，一种外来的宗教——佛教东传，它给中土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的思想文化潮流，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以很大震动。中国人在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，对这股思想文化潮流采取了积极欢迎的态度。当时在印度本土，大乘思想仍在发展中，新的经典和论著不断出现。这些经论很快就被在中国传译。中国人欢迎从天竺和西域来的义学沙门在中国传播教义，以至组织译场请他们译经讲学；另有许多人西行求法，间关万里远到佛教发祥地的天竺或西域去寻求佛教经典和知识。这样，佛教思想理论才能逐渐更真实正确地以其本来面貌介绍到中国来，中国人也才有对它深入研讨、汲取和发挥的可能。中国人对于佛教这种积极吸收的态度，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勇于学习的开阔胸襟，这也是佛教在中国生根、滋长的原因之一。

佛教在中国初传，主要作为信仰和方术流行于民间。其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，是从两晋时期开始的。接触到佛教的当时的中国士大夫，已经有中国儒家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的牢固的理性主义传统，又受到过老、庄与玄学抽象思辨的训练。他们对这种新传入的宗教颇具分析、批判态度。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，即所谓义学，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。这样，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，民众

佛教的粗俗信仰和知识界中流行的“义理佛教”明显地发生了分化。知识阶层中许多相信或倾心佛教的人,较少对于地狱天堂、六道轮回之类的迷信,而主要是从学理上研讨、赞赏和相信佛家学说。后来的居士思想和居士佛教就是这种倾向的发展。古代的一些不信佛或反佛的人,也研习佛典,并从中汲取某些思想资料。正因此,中国佛教才创造出众多的学派和宗派,它们各有典据,各有传承,各有丰富的理论思想,都给中国思想学术史提供了一定的贡献或资料。

另外,佛教自输入中土,直到唐宋以至后来,不断有人著文攻击佛教是“夷狄之法”、蠹国病民;统治阶级中也出现过“三武(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)一宗(后周世宗)”,演出了酷烈的灭佛事件;但从总的倾向看,在中国,儒、佛、道三教是在斗争中发展,在发展中交流的。六朝士大夫间,调和三教的思想已成为潮流。鲁迅先生曾指出过:“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,凡有文人学士,道士和尚,大抵以‘无特操’为特色的。晋以来的名流,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,一是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,二是《老子》,三是《维摩诘经》,不但采作谈资,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。唐有三教辩论,后来变成大家打诨;所谓名儒,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宋儒道貌岸然,而窃取禅师的话录。”^①这种思潮,有利于各种思想在交流与斗争中融合,也使得佛教的“中国化”成为可能。宋代以后,理学兴起,强化了儒家“道统”的思想一致性。但理学本身就是统合儒、释的产物。禅宗的“明心见性”和华严的“事理圆融”等观念都是理学的有机内容。我们不

① 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第310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。

可拿今天对宗教的革命批判态度去要求和评价古人，也不可用儒家一统观念来看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历史。

以上所述中国佛教发展的情况和特点，决定了它对中国思想文化必然产生深刻影响。这种影响不只表现在信仰、观念等表面，更及于理论思想以及思维方式的深层。可以说，由于受到佛教影响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产生了重大的改变。至于改变得好与不好，值得另外进行探究；但改变发生了则是事实。这种改变也发生在文人身上，发生在文学理论与实践之中。其具体情形，就是本书所要描述的。

我们可以说，不了解佛教，不探讨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，就不能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。而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，起码还在以下两方面有重大意义。一是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了解。佛教传入了，被中国人吸取了，它溶入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中，铸造成了它的长处和短处，成就和缺点，起过积极作用也起过消极作用，在今天也还有重大影响。我们通过分析佛教影响中国文学这一个侧面，对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会加深认识。二是佛教东传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。对中国来说，是外来文化的大规模的输入。这种输入伴着宗教传布进行，有它的成绩，也有它的失败处。中国人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教训，是值得我们汲取的。佛教影响于中国文学，也是这种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。

本书只是对佛教影响中国文学的情况的一个“描述”。即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，对有关历史事实加以记叙说明。目前虽然佛教与文学关系的诸问题已被更多的人所重视，国内外已有前辈与时贤开拓探讨，多有劳绩，但对基本历史情况尚缺全面梳

理。本书只提供一个概括的材料。由于笔者学识、才力所限,内容一定会有许多疏误之处。当然,“描述”中也不是没有观点。书中对一些问题也提出了不成熟的看法,允当与否,亦殊无把握。

笔者之所以给自己确定这个“描述”的任务,还因为深刻意识到:事实是科学研究的立足点,实事求是它的基本原则。以前一些论者在关于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的诸问题上时常下草率、简单的论断,很重要的原因是忽视历史事实。实际上,只有在真正弄清历史的真实情况之后,认真的科学研究方才开始。所以,笔者所做的,还只是研究开始前的准备工作。期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,引发起更多的人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趣,并取得优异的研究成果。

作者识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章 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	1
一 佛典的文学性质	1
二 佛典翻译与译经文体	29
三 佛典的文学表现	45
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文人	60
一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文人	61
二 隋唐五代的佛教与文人	85
三 宋至晚清的佛教与文人	143
第三章 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	222
一 散文	223
二 诗歌	246
三 小说	259
四 戏曲	290
五 俗讲与变文	297
六 宝卷	310
第四章 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	322

一	六朝佛教义学与文学创作新观念·····	323
二	言、意关系问题·····	340
三	“境界”理论·····	347
四	以禅喻诗·····	355
后	记·····	382

第一章 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

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扩大影响，一方面靠僧团的传教活动，一方面则要靠佛典的传译与流通。佛、法、僧是佛教的三宝，佛的教法就记录在佛典里。中国文学和文人接受佛教的浸染，与佛典的翻译和传播更有直接关系。自两晋以后，佛教广泛而深入地流传到文人之中，文人们研习佛典渐成风习。对于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文化修养的中国知识阶层来说，佛典的精密义理、恢宏想像及其华美表现，较之僧侣们的粗俗的宗教宣传也更有吸引力。因此佛典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刻的。就是一些对佛教并无兴趣甚至是反佛的人，也接触到某些佛典，并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它的浸染。因此我们探讨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，首先要研究一下佛典在中国的传译及其文学价值，以及译经对中国固有文体的直接影响。

一、佛典的文学性质

佛典，一般称作佛经，本来是佛教传教的文字记录，一种宗教宣传品。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（约公元前565—前

486^①，尊称为“佛”、“佛陀”）及其弟子和后世的信仰者们，在延续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，制作出大量佛典，主要是为了宗教宣传。佛陀的教法、佛陀的形象，也主要是依靠这些佛典流传下来的。但是佛典的价值，又远远超越于宗教宣传之外。这是因为在数量庞大的佛典中，除了教义宣传和迷信说教，还包含着关于社会、历史、经济、法律、哲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、美学、文学、艺术、语言学以及医学等自然科学许多领域的广阔而有价值的内容。佛典在宗教宣传的形式之下，凝集了古代印度^②人民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。就其有关文学的内容而言，许多佛典的语言和表现是非常富于文学性的；一些佛典包含着古代印度的民间文学创作；还有一些本身就是文学作品。所以学术界才有“佛典文学”以及“佛典翻译文学”这些概念。正因此，也就加强了它对中国文化以及文学的影响力量。

佛典中的“经”，按佛教传统说法，就是佛陀说法的记录。佛陀姓乔答摩，名悉达多，释迦牟尼是他的一种尊称，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。据传他是古印度北部一个小国迦毗罗卫国（在今尼泊尔境内）的王子，29岁出家，35岁悟道，到80岁入寂以前45年之间，说法教化，信众甚多。他遗留下的弟子形成僧团，严格戒律，整理经典，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。按狭义说，只有佛陀说法的记录才叫作“经”；但按广义说，规定教团和僧侣行为规范的“律”和后代信仰者阐释“经”的“论”，也可统称为

① 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，已不可确考。据日本佛教学者中村元等人的考证（《ブツダの世界》，学研社1980年版）为前463—前384。

② 这里所谓“印度”，是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其范围不限于现在的印度共和国，还包括尼泊尔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、斯里兰卡等地。